

劳动力市场冲击下青年初次就业的疤痕效应^{*}

刘金东 唐诗涵

内容提要:劳动力市场冲击下初次就业市场不景气会给青年就业者带来持久的收入损失,同时造成不同就业队列间和同一就业队列内的收入差距,从而恶化收入分配。本文以 SARS 疫情暴发叠加高等教育扩招首批本科生毕业季的 2003 年为事件冲击时点,基于城镇住户调查(UHS)数据实证研究了劳动力市场负面冲击对青年就业群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其一,劳动力市场冲击下的失业风险显著加剧了青年人力资本错配问题,造成了初次就业青年群体相对收入下降的疤痕效应;其二,2003 年就业的青年群体收入相比非 2003 年就业的青年群体显著偏低,这一收入差距持续 4 年才逐渐消失;其三,疤痕效应的显著程度和持续时间对于不同群体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对于低学历和体制内群体的收入影响更大,性别间和不同地区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其四,青年群体收入水平的下降阻碍了消费升级,在短期内因为超前消费保持了消费升级态势,但对发展享受型消费的负面效应从第二年开始显现并持续到第五年。本文的研究显示出失业风险冲击对青年就业不仅仅是短期数量上的影响,更是长期质量上的影响,造成消费疲软的关键仍然在于就业质量不足。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未来中国精准施策稳就业、促消费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揭示了促进青年更充分和高质量就业的人口学意义。

关键词:青年失业率 初次就业 就业质量 疤痕效应

作者简介:刘金东(通讯作者),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250014;

唐诗涵,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硕士研究生,250014。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3)08-0127-15

一、引言

“青年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青年群体就业困难一直是全球性问题,在中国也日趋突出,“毕业即失业”成为很多高校毕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体制内就业偏好的形成、影响及干预研究”(19YJC790081)。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刘金东电子邮箱:kuangzhu1990@163.com。

业生面临的现实问题。在当前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冲击下,我国青年群体进一步面临就业规模升高和失业问题严重的两难局面。16~24岁青年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在波动中攀升,至2023年5月达到历史新高的20.8%(见图1)。为确保就业形势稳定,《“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首次明确提出促进青年就业,并做出单独的部署安排,力求在“十四五”时期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强调“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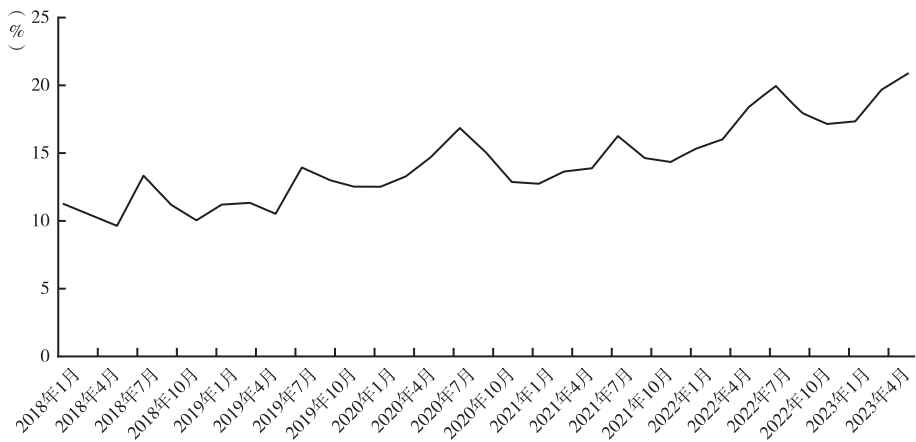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青年失业率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已有大量分国别的微观研究探讨了初次就业市场表现对未来收入的长期影响,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冲击下初次就业群体收入水平的长期滞后效应,如 Kahn (2010)、Oreopoulos 等 (2012) 均验证了经济下行时期初次就业市场不景气会给初次就业者造成持久收入损失,并将这一现象称为“疤痕效应”(Huckfeldt, 2022)。这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冲击下,我们不能仅关注就业数量维度的失业率,青年失业率向就业质量维度的内在传导机制同样不容忽视。对于初次就业市场表现的长期影响研究在中国尤其重要,国内劳动力市场二元化分割严重,形成了规范就业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保障程度低、就业稳定性差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一旦不能在初次就业时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则极易终生受到不利影响(张敏等, 2022)。

我们选取2003年作为一次典型的劳动力市场冲击时点。一方面,2003年SARS疫情席卷中国十多个省市,居家隔离对服务业等行业造成巨大冲击,劳动力市场需求紧缩下的失业效应明显;另一方面,我国于1999年开始高等教育扩招,而SARS疫情严重的2003年上半年恰好是高等教育扩招第一批本科生毕业季,在需求收缩和供给放大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一次对劳动力市场的典型冲击。与此同时,研究SARS疫情冲击给就业、收入、消费带来的影响也对探究目前新冠疫情的相关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基于城镇住户调查(UHS)数据实证检验了失业风险冲击对青年就业群体收入分配的长期影响,指出青年失业率在冲击下很容易向就业质量传导,从而显著加剧青年人力资本错配问题,造成青年初次就业群体持久性收入损失的疤痕效应,收入的疤痕效应不仅扩大了不同就业队列间的收入差距,也扩大了队列内不同禀赋青年就业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相比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类型单位,不同学历的就业者之间收入疤痕效应差异最为明显。同

时,本文也检验了青年群体因冲击影响而产生的消费疤痕效应。

相比已有研究,本文主要有如下几点可能的边际创新贡献。首先,在国内首次以2003年SARS疫情暴发恰逢高等教育扩招首批本科生毕业季的时间点作为冲击,实证分析检验了初次就业市场不景气给青年就业者收入和消费带来的双重疤痕效应,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缺失;其次,同时探讨了劳动力市场负面冲击给青年初次就业者带来的长期队列间收入差距和队列内收入差距,为长期视野下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前瞻性视角;最后,论证了以失业率衡量的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之间的传导效应,为当前新形势下协同推进更充分就业和更高质量就业提供了学理基础。

二、相关文献综述

(一)初次就业市场不景气对青年收入的影响机理研究

初次就业市场表现对青年群体的影响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初次就业市场不景气会对青年群体的收入水平产生直接的短期影响。从劳动力市场需求侧来看,经济下行期的岗位雇佣规模会收缩,企业倾向于在经济下行期调整岗位需求规模,相比裁减存量老员工而言,降低增量员工的招聘规模更易于实施,不会带来法律成本和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冲击,故而初次就业的青年群体相比已经在职的中老年群体受到的影响更为强烈(都阳,2013;Abbritti和Fahr,2013)。除了招聘规模,企业也会进一步调整招聘结构,优先选择有工作经验的老员工,以尽力降低企业在经济下行期的运营成本(Forsythe,2022)。即使是已经入职的青年员工,在企业不得不裁员的“失业配额”机制下也会因为缺乏专用人力资本积累而被当作首当其冲的裁减对象(Michaillat,2012)。由此可见,青年初次就业群体是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冲击的“就业调节器”。从劳动力市场供给侧来看,青年就业者很难降低自身的劳动供给数量(Kahn,2010),故而需求收缩下出现了供需失衡的局面,造成青年就业者搜索成本更高,实现员工-岗位最优匹配的时间更长(Topel和Ward,1992)。青年就业者想要快速解决就业问题,就需要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差的岗位。即使有青年人通过缓就业、慢就业来改变劳动供给的时间配置以规避冲击,但由于失业等待时间意味着人力资本积累为零,等待机会成本太大,可能会促使大学生遭受更为严重的经济损失(Ortego-Marti,2016;Fujita,2018)。Marinescu和Skandalis(2021)利用法国在线求职平台微观追踪数据的研究发现,求职者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薪资在失业保险救济金用尽前一年至少调低了2.4%,此后随着失业等待时间的递增,他们会不断调低目标薪资,平均每年约为1.5%的降幅。由此可见,经济下行时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就业质量下降的结果。部分研究者如Oreopoulos等(2012)、刘金东等(2022)提出就业数量向就业质量的传导机制,认为当代表就业数量维度的失业率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将影响就业者预期,促使就业者退而求其次接受质量更低的工作岗位,从而向代表就业质量的收入端传导,最终影响就业者的薪资水平。此时,失业率指标相当于向市场发送了一个可置信的威胁信号,从而迫使青年就业者遭受收入损失。

(二)初次就业市场不景气对青年收入的疤痕效应研究

Kahn(2010)、Oreopoulos等(2012)、Hamaaki等(2013)分别针对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多个发达国家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下行期就业对青年群体的长期影响,发现经济冲击下初次就业市场表现不佳导致就业者和其他年份就业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收入差距,这种收入上的“疤痕效应”需要6~25年不等的时间才可能逐渐消弭。初次就业市场表现对青年群体就业质量的长期影响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一是低质量的人力资本积累。更差的初次就业机会意味着更低效的专

用人力资本积累过程,让就业者很难在未来获得好的内部晋升和外部跳槽机会(Oyer, 2006)。起点越低,未来工作岗位变动越频繁,每一段工作岗位的滞留时间越短,故而积累专用人力资本的机会更为不足,累积效应下造成个人很难在未来胜任一个高薪岗位,从而在长期视野下抑制了收入增长空间(Oreopoulos 等, 2012)。二是年龄的局限性。随着青年就业者成家立业,外部“跳槽”和内部调整岗位所需要连带做出的家庭调整成本也越来越大,故而对青年就业者而言,其所获得的第一份工作很可能成为其未来的长期归宿(Oreopoulos 等, 2012)。Topel 和 Ward(1992)的研究显示,劳动者一生之中 2/3 的薪资涨幅是在参加工作的前十年中实现的,这一生命周期视野下的收入规律也让初次就业市场表现成为决定个体持久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三是信号筛选作用。根据筛选理论,初次就业质量释放了个体能力信号,雇主为了廉价获得信号,会异常重视上一任雇主给予的岗位质量高低,以快速判断该员工的工作能力(Genda 等, 2010)。以临时工、兼职工等为主的低质量就业岗位很难转为全职员工,正是因为雇主并不能有效辨别一个工作能力不强但幸运获得全职工作的人和一個工作能力突出却不幸未获得全职工作机会的人,故而会将未获得全职工作看作工作能力不足的信号,从而让青年就业产生严重的历史路径依赖(Hamaaki 等, 2013)。四是非经济因素的连带影响。初次就业市场不景气不仅会影响青年就业结果,还会带来非经济性影响。Sullivan 和 Von Wachter(2009)基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就业人员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失业状态下的死亡率会显著高于就业状态,劳动力市场疲软下的收入降低和不稳定性增加促使个人健康投资减少和慢性压力增大,是造成健康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这些非经济层面的影响又会进一步导致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放缓和持久收入水平降低,从而间接带来更加长远的负面影响。

(三)文献评述

关于劳动力市场冲击下初次就业市场表现如何影响青年收入的研究文献仍然主要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且侧重点各有不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则刚刚起步。目前只有罗楚亮等(2022)、刘金东等(2022)基于中国城镇住户调查(UHS)数据实证检验了初始劳动力市场条件对个体就业表现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罗楚亮等(2022)只是考察了就业者所在省份失业率对个体长期收入水平的影响,失业率指标的选取较为粗糙,也并未证明其形成了一次失业率冲击。刘金东等(2022)虽然以 2008 年经济危机作为一次典型冲击进行实证研究,但对个体长期影响的追踪仍然不够,2008 年经济危机对国外影响较大,在国内由于财政刺激政策的影响反而带来的失业问题并不突出,也让研究的意义有所弱化。目前来看,国内相关研究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一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劳动力市场冲击事件作为切入点考察初次就业市场表现对青年群体的长期影响;二是虽然探及了就业数量到就业质量的传导,但并未涉及队列间和队列内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三是实证研究过于聚焦在收入层面,没有兼顾对消费的长期影响,减弱了对当前国情现实的启示意义。

三、背景介绍与数据来源

(一)背景介绍

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另辟蹊径选取 2003 年大规模暴发的 SARS 疫情事件作为对劳动力市场的外生冲击,考察初次就业市场表现给青年收入带来的长期影响。SARS 疫情始于 2002 年底,先是在中国的广东省零星出现病例,2003 年 2 月由卫生部派出工作组赴广东省指导防治工作。此时,疫情信息开始在全国扩散并产生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2003 年 6 月中旬,中国内地实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既往疑似转确诊病例数均为零的“三无”纪录。至 2003 年 7 月中旬,全球非典患

者人数、疑似病例人数均不再增长,疫情到此完全结束,疫情自全国蔓延并引发广泛关注至完全结束大约持续了 5 个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的“非典与就业”研究报告认为,突如其来的 SARS 疫情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使中国部分地区和行业达到失业警戒线的边缘。从人群来看,影响大的是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大学生。全国就业存量在这种突变中受到影响的有数百万人,其中以疫情严重地区为多。2003 年恰逢 1999 年扩招后第一批四年制本科生毕业,在此之前,中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一直处于温和增长的状态,1999 年是我国高等教育招生的重要转折年份,招生人数比上年一次性增长近 50% (刘灿雷、高超,2021),造成自 2003 年开始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直线提升。SARS 在 2003 年高校毕业季的蔓延对就业的影响无形中加剧。根据蔡昉和王美艳(2003)的测算,SARS 疫情直接造成的失业人员规模约为 530 万人。岳昌君和周丽萍(2017)根据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对全国 28 所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抽样调查研究显示,受 SARS 疫情的不良影响,2003 年“就业+升学+灵活就业”的毕业“落实去向”比例只有 59.8%。有就业意愿却未能顺利找到工作的“待就业”毕业生占比达到 35.8%,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前后所有年份。SARS 疫情暴发叠加扩招影响,不仅造成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劳动力供给增多,也造成了企业端劳动力需求的收缩,从而让劳动力市场短期内供需严重失衡,促使当年的青年失业率显著上升,这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劳动力市场冲击下失业风险加剧的典型事件。

(二)数据来源

我们以 2003 年 SARS 疫情为冲击,选取样本量充足且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UHS)微观数据来验证以上研究假设。UHS 数据由国家统计局调查获取,涵盖北京、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甘肃和云南 16 个省市。考虑到研究需要,首先进行了必要的清洗,只保留 16~65 岁的受雇就业者,后续根据研究需求,进一步按照 16~24 岁、16~28 岁提取青年初次就业群体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去除四类异常值样本:本地居住年份大于年龄的样本,工作年限大于 50 年的样本,户口状况缺失的样本,纯工资收入为零且其他劳动性收入或者经营性收入不为零的样本。收入和消费疤痕效应的分析需要使用冲击发生后每个年份的情况,故而本文回归分析主要基于 UHS 2003—2008 年的截面数据。例如,2006 年 UHS 截面数据提供了个体和所在家庭的收入消费统计,我们以该年度收入和消费支出来评估冲击发生 3 年后的滞后影响。

四、青年初次就业群体的收入疤痕效应分析

(一)就业数量到就业质量的传导效应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并不是两个独立的概念,而是存在从就业数量到就业质量的传导效应,劳动力市场冲击下失业率(Unemployment)会影响就业质量不足(Underemployment),迫使就业者不得不接受学历要求更低、工资回报也更低的岗位。我们构建回归方程(1),参考罗楚亮等(2022)的做法,以个体初次就业地点当年失业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相比其在基准回归中以个体就业所在省份失业率来衡量就业市场景气程度,我们做了一定的细化和改进,以个体所在区县的青年失业率 $r_unem2003$ 为核心解释变量,按区县计算青年失业人员占青年就业人员和青年失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即为该区县失业率,该指标以原始数值呈现,介于 0~1。以青年个体就业质量 $underemp$ 为被解释变量,控制变量集 Θ 包括性别、民族、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为城镇户口、来本地居住年份、工作经验、行业虚拟变量、区县虚拟变量,考虑到有就业者来自同一家庭,存在组内相关性,回归中控制了家庭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underemp_i = \alpha_0 + \alpha_1 \times r_unem2003_i + \alpha_2 \times \Theta_i + \varepsilon_i$$

(1)

我们使用回归残差法来测算就业质量不足的程度。以行业虚拟变量、岗位级别虚拟变量、所在省份人均生产总值因素为解释变量,以受教育年限为被解释变量进行 OLS 回归,个体真实受教育年限与其拟合值的偏离程度即代表就业质量程度的高低,残差越大,即超出拟合值越多,意味着个体存在人力资本错配和过度教育问题,其就业质量相对越低。由于中国教育体制发展改革较快,中间还经历了不断的教育扩招冲击,即使是同一学历水平,不同年代、不同年龄群组之间也缺乏可比性,我们在回归中还加入了个体年龄作为控制变量。

表 1 基于 2003 年当年 UHS 调查数据的 OLS 回归选取了三种不同口径的初次就业样本,第(1)列是 16~24 岁的初次就业群体,这一口径与国内外统计青年失业率的年龄区间一致。考虑到中国扩招后研究生规模也水涨船高,初次就业群体中有大量研究生学历的毕业生,为了让我们的考察更加全面,第(2)列选择了更为宽泛的 16~28 岁的初次就业群体,尽可能将更高学历的研究生学历样本也纳入进来。考虑到越晚就业的初次就业群体人力资本贬值越严重,作为稳健性对比,我们在第(3)列也选取了 16~65 岁的初次就业群体进行 OLS 回归。OLS 回归结果均显示,2003 年个体所在区县的同龄群体失业率对该群体就业质量不足程度有显著正影响,即个体所在区县的同龄群体失业率越高,该群体就业质量不足程度越高,这表明劳动力市场冲击下失业率对个体就业质量不足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证明经济冲击下存在从就业数量到就业质量的链条传导效应。从系数大小来看,就业地青年失业率增长 1%,将导致劳动者就业匹配质量降低,其自身学历偏离岗位平均学历 0.15~0.26 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 1 月 16~24 岁青年失业率为 12.5%,而 2023 年 5 月已经达到 20.8%,这会导致劳动者自身学历超出岗位平均学历 1~2 年时间,造成的影响不可小觑。上述研究与 Barnichon 和 Zylberberg(2019)的研究是一致的,也验证了刘金东等(2022)针对中国情形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所得出的推论。根据 Barnichon 和 Zylberberg(2019),2008 年金融危机造成失业率短期内迅速攀升,个体就业质量不足的发生概率也随之迅速攀升。刘金东等(2022)则认为,当劳动力市场冲击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会促使失业率传导到就业质量,造成持久收入损失的问题,如果冲击足够大,可能需要接近一代人的时间才能熨平其对收入和消费的影响。

表 1 失业率对就业质量不足的影响检验

变量	被解释变量: <i>underemp</i>		
	(1)	(2)	(3)
	16~24 岁	16~28 岁	16~65 岁
<i>r_unem2003</i>	14.612 *** (3.78)	16.234 *** (3.77)	25.690 *** (3.2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区县虚拟变量	Yes	Yes	Yes
行业虚拟变量	Yes	Yes	Yes
聚类标准误	Yes	Yes	Yes
<i>N</i>	651	855	1112

注:(1)***、**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下同;(2)括号内为对应的t统计值;(3)受篇幅所限,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未呈现,留存备案。

(二)青年群体的收入疤痕效应分析

上一部分只是针对 2003 年当年的 UHS 数据得到的短期影响进行检验,在冲击下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从就业数量层面迅速传导到就业质量层面,造成受教育水平与岗位不相匹配的就业质量不足的问题,正如 Oreopoulos 等(2012)指出,失业的持续冲击迫使青年初次就业群体调整预期、接受一份回报更低的工作,从而形成相比非冲击时期同龄就业者的相对工资惩罚,工资惩罚带来的就业队列间收入差距将维持多年,形成长期的收入疤痕效应。这一部分将从短期影响转入长期影响分析,实证检验 2003 年的失业冲击是否会对 2003 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增量就业者工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以及这种负面影响能够持续多久。我们从 UHS 数据中通过参加工作年限倒推的方式筛选出来 2003 年参加就业的新就业者。以上下缩尾 1% 的个体工资收入 *wage* 为被解释变量,该指标来自 UHS 城市居民家庭成员工薪收入统计表,考虑到其中的“其他劳动收入”内容不明,此处仅取“工资及补贴收入”,单位为万元。同样参考罗楚亮等(2022)的方法,以个体所在区县 2003 年失业率衡量个体就业受到的冲击程度,将其与“个体是否为 2003 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样本”的交互项 *unem2003_new*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保持不变。交互项 *unem2003_new* 的系数衡量了 2003 年疫情时期的失业冲击对当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收入水平的净影响,整体构建模式类似于队列性质的 DID 模型,如式(2)所示:

$$wage_i = \alpha_0 + \alpha_1 \times unem2003_new_i + \alpha_2 \times \Theta_i + \varepsilon_i \tag{2}$$

我们依次使用 2003 年及以后年份的截面微观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汇总到表 2。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冲击对个体工资收入的负面影响是持久性的,自 2003 年持续到 2007 年才逐渐消失,前后维持约 4 年的时间,与罗楚亮等(2022)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4 年间的累积系数约为 -3.38,由于按区县统计的 16~24 岁青年失业率平均达到 29.08%,故而其给疫情防控期新就业的个体带来的累积收入损失达到 0.9836 万元,考虑到利率因素,该收入损失规模将在万元以上。本文限于数据追踪指标匮乏无法更深入地剖析,但 Oreopoulos 等(2012)基于加拿大大型追踪数据的研究结论揭示了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在经济衰退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就业者初始岗位收入水平相比正常时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同类就业者显著偏低,这一队列间收入差距只能通过后人者“干中学”提高工作技能和“跳槽”换工作才可能被慢慢抹平,就他们的研究来看,经济衰退期的大学毕业生平均需要耗费约十年时间才能弥补初始就业起点上的收入差距。十年是总样本回归得出的平均值结果,如果细分不同群体,越是资源禀赋少、就业能力弱的个体所需要耗费的时间越长,甚至终其一生的收入轨迹曲线都要在未受冲击的同龄劳动者之下。

表 2 青年初次就业群体的收入疤痕效应检验

变量	被解释变量: <i>wage</i>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i>unem2003_new</i>	-1.620*** (-12.87)	-0.640*** (-6.59)	-0.520*** (-4.98)	-0.599*** (-5.40)	-0.133 (-0.51)	-0.163 (-0.7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区县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聚类标准误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42556	42947	43354	43836	11180	12240

注:包含 2003 年之外其他年份参加工作的就业样本,故而样本量远大于表 1。下同。

(三)稳健性检验^①

1. 放宽年龄范围

现实中存在大量“缓就业”“慢就业”的就业者和高学历深造的初次就业年龄超出我们限制的范围,故而将青年群体的年龄范围从 16 ~ 24 岁放宽到 16 ~ 28 岁,进行收入疤痕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论与表 2 保持一致。

2. 考虑历史累积影响

历史累积影响会干扰 2003 年政策冲击的“纯洁性”,让核心解释变量区县青年失业率不再单纯是当年冲击所形成的,故而我们以 2003 年各区县青年失业率为被解释变量、以之前年份青年失业率为解释变量回归得到的残差替换 2003 年区县失业率,尽可能剔除往年历史累积影响。同时,以 2003 年与 2002 年青年失业率的比值替换 2003 年区县失业率,无论是残差法还是比值法,基于新解释变量的逐年回归结果与表 2 保持一致。

3. 基于 PSM 的回归

考虑到 2003 年就业者可能和其他年份就业者之间因为历史累积影响、个体禀赋不同等因素本身存在特征差异,故而我们先进行有放回的 1:1 近邻匹配后再回归,原有结论保持不变。

4. 考虑遗漏变量

参考 Oster(2019)的做法,利用可观测变量来度量未观测变量带来的可能偏差,统计结果基本上可以排除前文结论因遗漏变量而出现估计偏差的可能性。

5. 排除人口迁移

考虑到人口迁移可能会影响收入水平,按照个体“开始参加工作年份”是否大于“何时来本市镇居住年份”来判定是否有迁移行为,剔除迁移人口的回归结论没有发生改变。

6. 考虑工作经验非线性影响的干扰

工作经验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单纯在线性回归中加入工作年限变量并不一定能够控制全部的估计偏误。我们依次剔除 2003 年之前就业的样本回归、筛选 3 ~ 5 年工作经验的子样本单独回归、在控制变量中额外加入工作年限与其他所有控制变量的交互项,重复基准回归的结果与原有结论保持一致。

(四)异质性分析

除了队列间收入差距,同时受到失业风险冲击群体的内部还存在队列内收入差距,不同禀赋、不同能力的个体克服市场不利因素的难易程度不同,故而有必要进行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不同学历的青年就业者就业能力存在高低差异,受到的影响程度可能不同(Oreopoulos 等,2012)。我们以受教育年限是否达到 15 年(是否为本科及以上学历)为标准划分高学历样本和低学历样本,分别回归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冲击下的工资惩罚,结果如表 3 所示,显示高学历者的工资惩罚持续时间要少于低学历者,高学历者受到的工资惩罚持续了 2 年,而低学历者受到的工资惩罚则持续了 4 年。虽然从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来看,高学历群体要高于低学历群体,但这是由高学历就业者的工资绝对数额偏高所致,拥有更高工资水平的群体一旦受到工资惩罚,其惩罚的绝对数额也必然高于低工资水平群体。高学历者有更强的就业禀赋和能力,能够通过公司内部更多的岗位提拔机会和公司外部更多的跳槽机会来弥补初次就业起点带来的经济损失,故而能够更快地恢复到正常工资水平。相对而言,低学历者缺乏就业能力优势,从更低的起点以更低的速度

^① 受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相关回归结果未列出,留存备案。

进行职业发展,积累专用人力资本的效率非常低,较难有良好的内部提拔和外部跳槽机会,从而更难回到正常工资收入的轨道上来。虽然我们的研究结论是低学历者用4年的时间弥补了工资惩罚,但这只是低学历样本的平均回归结果而言,根据 Oreopoulos 等(2012)的追踪数据,很多弱势群体终其一生也始终低于其本应有的正常工资水平,从而遭受了永久性经济损失。

表 3 高学历者和低学历者的异质性分析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高学历者	- 2. 940 ***	- 1. 083 ***	0. 075	- 0. 421	- 1. 307	- 0. 232
低学历者	- 1. 395 ***	- 0. 567 ***	- 0. 553 ***	- 0. 601 ***	- 0. 019	- 0. 123

注:为了直观比较不同组别之间核心解释变量 *unem2003_new* 的系数,简化了统计值、控制变量、固定效应、聚类标准误、样本量和 R² 等内容,留存备案。下同。

不同性别就业者所面临的就业压力也不相同,男性劳动力供给由于较少受到生育行为的影响,故而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更高的需求,当然,女性虽然在劳动力市场需求上不比男性有优势,但其劳动力供给弹性更大(Maclean 等,2016;詹鹏等,2021),故而均衡的就业薪资水平并不必然低于男性,在经济冲击下受到的工资疤痕效应也并不必然高于男性。表4分性别的回归结果显示,女性就业者受到的工资惩罚持续时间并不长于男性,同时其工资惩罚系数的绝对值也显著小于男性。当然,这其中有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使然,但男性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比女性平均高出75.71%,这一幅度要显著高过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程度。这表明女性劳动供给弹性大的属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前文所述,一旦就业形势不好,减少劳动参与的机会成本也相对降低,年轻的女性就业者很容易会选择结婚生育,从而完全脱离劳动力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劳动力市场上剩余女性的均衡工资水平。

表 4 不同性别的异质性分析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男性	- 1. 917 ***	- 0. 938 ***	- 0. 890 ***	- 0. 813 ***	- 0. 134	- 0. 419
女性	- 1. 416 ***	- 0. 510 ***	- 0. 240 *	- 0. 428 ***	- 0. 561	- 0. 087

由于体制内和体制外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不同,薪酬体系也存在很大差异,体制内是一种共享式薪酬分配体系,体制外则是一种充分竞争的贡献式薪酬分配体系(邢春冰,2005;刘金东等,2020)。我们也划分了体制内和体制外样本分别进行子样本回归。表5回归结果显示,体制内初次就业者受到工资惩罚的持续年份与体制外基本相当,但体制内受到工资惩罚的幅度却显著高于体制外。这一结论虽然有违体制内“避风港”的一贯印象,但其实有迹可循:在经济下行时期,劳动力市场全面紧张,供需不相匹配造成所有单位都会提高岗位招聘的标准,体制内也不例外。与此同时,经济下行时期,体制内的稳定性特征吸引了更多青年就业者首选进入体制内。双重原因交织下,促使更多高学历的就业者“涌向体制内”,造成体制内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更高,人力资本错配更加严重。根据近三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岗位招聘数据,2019年招考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岗位占比仅有53.9%,2020年和2021年这一比例提高到67.7%和68.7%。由于体制内特别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岗位薪酬并不是市场化竞争的结果,往往是按照固定的增长率或者与级别挂钩的方式增长,故而较难直接体现出个人努力的结果,从而造成这种工资惩罚的影响相对更大。

表 5 体制内外的异质性分析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体制内	- 2. 146 ***	- 0. 735 ***	- 0. 603 ***	- 0. 742 ***	- 0. 511	0. 076
体制外	- 1. 284 ***	- 0. 612 ***	- 0. 460 ***	- 0. 424 ***	0. 110	- 0. 576 *

考虑到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发达程度不同,所受到的冲击程度也可能存在差异,我们进一步划分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进行子样本回归。表 6 回归结果显示,三个地区之间在工资惩罚持续时间上并没有明显差异,都和总样本一样维持了 4 年,系数估计值大小基本上相当于三个地区之间平均工资差异水平。这意味着不同地区在 2003 年失业风险冲击下受到的收入疤痕效应并没有本质差别,基本符合全国总样本的一般规律。

表 6 不同地区的异质性分析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东部	- 2. 208 ***	- 0. 907 ***	- 0. 441 **	- 0. 492 **	- 0. 250	- 0. 211
中部	- 1. 378 ***	- 0. 461 ***	- 0. 588 ***	- 0. 651 ***	- 0. 090	- 0. 071
西部	- 0. 848 ***	- 0. 482 **	- 0. 471 **	- 0. 452 ***	0. 289	0. 243

五、进一步拓展研究:青年初次就业群体的消费疤痕效应分析

上文研究已经发现,劳动力市场冲击下初次就业市场不景气造成青年初次就业者的就业质量不足和人力资本错配,并在就业后形成长达四五年的收入疤痕效应。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消费率和年龄之间呈现 U 型关系,即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的消费倾向更高,中年群体的消费倾向最低。作为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一旦青年就业者收入受到长期的疤痕效应,将势必影响其消费意愿。新冠疫情期间国内消费的变化也似乎给我们提供了现实证据,出现消费随产出下降而超速下降、却不能随产出回升而同步恢复的奇特局面。依上文逻辑推测,“消费与产出偏离之谜”的根源即在于就业,就业质量下降带来了持久性收入损失,故而对消费下降的影响也是持久性的,很难通过短期的财政刺激从根本上扭转消费颓势。消费易跌难升的局面恰好对应了劳动经济学领域提出的“就业回滞”现象,失业率容易随经济下行而上升、却很难随经济上行而恢复(丁守海等,2010)。就业关联收入,收入影响消费,故而疫情冲击下“就业回滞”是造成“消费回滞”的源头。这一部分将进一步利用 UHS 数据逐年回归检验劳动力市场冲击下青年群体的消费疤痕效应。

(一)消费疤痕效应检验

由于消费支出不能像收入一样精准归到个人身上,我们以受访者所在家庭的消费水平作为消费疤痕效应的检验对象,将式(2)中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家庭消费指标,考虑到消费必然会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故而在保留原有控制变量集合的同时,额外控制了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考察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受到的消费疤痕效应,表 7 回归结果显示,人均消费支出受到的消费惩罚维持了 3 年,相比收入惩罚,影响的持续程度偏弱一些,可能是因为消费的内在分类不同,基本生存型消费支出存在刚性和惯性特征,由恩格尔定律可知,即使是对低收入家庭,基本生存型消费支出仍然是无法规避和灵活调整的。青年群体刚刚参加工作,消费也有其特殊性,需要购置的

物品较多,边际消费倾向也较高,故而维持了较高的消费水平。考虑到基本生存型消费并不容易受到收入多寡的影响,我们进一步针对代表消费质量的发展享受型消费进行消费疤痕效应检验,参考孙豪等(2022)的划分,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主要包括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三类。表7回归结果显示,人均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受到的消费惩罚年限持续更长,达到5年时间,表明其调整的弹性空间更大,也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冲击下,收入下降压力促使家庭消费质量出现下滑,这对我们推动消费升级产生了不利影响。

表 7		消费疤痕效应检验					
	消费口径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人均消费支出	总消费	-0.123 **	-0.150 ***	-0.100 **	0.107	-0.050	0.203
	发展享受型消费	-0.054 *	-0.095 ***	-0.109 ***	-0.089 ***	-0.123 **	-0.021
占可支配收入比重	总消费	-0.050	-0.184 ***	-0.133 ***	-0.023	-0.088	-0.024
	发展享受型消费	-0.055	-0.120 ***	-0.108 ***	-0.086 ***	-0.104 ***	0.026
	发展享受型消费(去样本)	-0.060 **	-0.096 **	-0.090 **	-0.081 ***	-0.063 **	-0.003
占消费比重	发展享受型消费	-0.046	-0.088 ***	-0.097 ***	-0.114 ***	-0.095 ***	0.004
	发展享受型消费(去样本)	-0.054 *	-0.088 ***	-0.101 ***	-0.111 ***	-0.081 **	-0.006

注:除了以上控制变量外,还额外控制了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下同。

除了人均消费支出的绝对数额,我们也考察了消费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消费率口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消费支出还是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以消费率口径估计的消费疤痕效应与表8以人均消费支出口径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消费惩罚维持年份分别达到3年和5年。所不同的是,消费率口径估计结果出现第一年不显著的奇特情形,这可能是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由于封控政策造成居民无法及时消费,在解除封控后出现报复性消费反弹,在新冠疫情数次解除封控后也出现类似情况。由于政府主导的疫情隔离以保障基本生活为前提,故而并不影响基本生活消费,但阻碍了发展享受型消费。因此,在报复性消费反弹阶段,青年消费水平将和收入出现短暂脱钩,且主要追加的是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进一步删除消费支出超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超前消费样本后,发现发展享受型消费疤痕效应在第一年的估计结果重新恢复到显著为负的状态,部分印证了我们的推测。

为稳健性起见,我们也进一步考虑了消费结构口径,检验发展享受型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如何受到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影响。表7估计结果显示,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受到的消费疤痕效应维持了5年时间,与前文分析结果保持一致。同时,第一年不显著,在去掉全年消费支出超出当年可支配收入的超前消费家庭样本后第一年变成显著为负,也与前文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

考虑到青年人在初次就业之前原本就是家庭内部无收入、有消费的一分子,其作为家庭的附庸者,个体有收入与否以及收入多少可能并不会对家庭人均消费产生实质影响,这将影响到上文以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可信度。基于此,我们筛选了在家庭中“举足轻重”、绝非附庸者的青年人样本进一步重复原有的回归。由于青年新婚后单独成家的样本较少,难以独立回归,我们筛选了两种口径的子样本:一是在当前家庭中收入水平居首位的样本,二是在当前家庭中收入水平居首位的样本与显示为户主的样本之和,这意味着青年人要么是独立成家的户主,要么

是大家庭收入的主要贡献者,其所遭受的收入疤痕效应也将更加容易转化为家庭人均消费上的疤痕效应。我们重复了上文表 7 的回归结果,显示原有结论均未改变,这意味着文中关于消费疤痕效应的结论具有稳健性。受篇幅所限,回归内容未列出,留存备索。

(二)高低学历样本的消费疤痕效应对比

上文收入疤痕效应中的异质性分析显示,高低学历样本之间差别最为显著。那么,收入疤痕效应的显著差异是否会转化为消费疤痕效应的显著差异?这一部分我们单独对高低学历样本的消费疤痕效应展开异质性探讨。表 8 回归结果显示,两类群体之间的消费疤痕效应在全口径消费上差异不大,甚至在人均消费支出的消费惩罚上出现高学历者持续年份长于低学历者的局面。但由于发展享受型消费需求收入弹性对于高学历者而言要小于低学历者,如果单纯对比发展享受型消费的话,低学历者的消费疤痕效应更强,持续年份也更长。由此可见,收入的疤痕效应更多是转化为发展享受型消费的疤痕效应,高低学历群体之间的疤痕效应差异也主要表现为发展享受型消费的疤痕效应差异,低学历者受到的影响更为持久,对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后续治理中,未来稳就业、保工资以及促进消费升级的重点对象都应该是就业弱势群体。

表 8	高低学历样本的消费疤痕效应异质性分析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Panel A:人均消费支出						
高学历	-0.484 **	-0.275 **	-0.293 **	0.339	-0.412	0.173
低学历	-0.058	-0.129 ***	-0.057	0.043	-0.017	0.201
Panel B:人均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						
高学历	-0.159 *	-0.147 **	-0.211 ***	0.012	-0.116	-0.136
低学历	-0.036	-0.082 ***	-0.080 ***	-0.105 ***	-0.142 ***	0.013
Panel C: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						
高学历	-0.228	-0.263 ***	-0.193 **	0.120	-0.290 **	0.024
低学历	-0.003	-0.165 ***	-0.121 ***	-0.054	-0.060	0.033
Panel D: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						
高学历	-0.075	-0.132 **	-0.154 ***	-0.019	-0.102	-0.039
低学历	-0.049	-0.114 ***	-0.096 ***	-0.097 ***	-0.113 ***	0.049
Panel E: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去掉超前消费样本)						
高学历	-0.115 **	-0.111 ***	-0.098 ***	-0.049	0.019	-0.015
低学历	-0.049	-0.089 ***	-0.081 ***	-0.082 ***	-0.078 **	0.004

六、结论与建议

经济下行时期初次就业市场不景气对青年群体收入的疤痕效应已经在欧美发达国家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在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相关研究依然匮乏。本文选取 SARS 疫情暴发叠加 1999 年高等教育扩招首个本科生毕业潮的 2003 年作为劳动力市场冲击事件,研究 2003 年失业风险冲击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带来的收入惩罚和消费惩罚的疤痕效应。发现失业风险冲击显著加剧了青年就业质量不足、人力资本错配问题,带来相对收入降低的疤痕效应,这一影响平均持续

4 年才逐渐消失,该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对于低学历和体制内群体的收入影响更大,性别间和不同地区之间并无显著差异。青年群体收入水平的下降阻碍了消费升级,在短期内可能因为超前消费保持了消费升级态势,但对发展享受型消费的负面效应从第二年开始显现并持续到第五年,低学历群体受到的影响要显著大于高学历群体。上述研究结论对我们未来政策选择具有多重启示。

首先,要重视初次就业市场公平对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初次就业机会均等是初次分配公平的关键一环,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时间的持续不断加深和演化,最终将流量的收入分配差距积累成为存量的财富分配差距,造成群体之间的不公平性,并会沿着代际关系向下一代传递。青年初次就业不仅关乎“把蛋糕切好”,还关乎“把蛋糕做大”,只有给予初次就业群体更为合理公平的就业环境,畅通向上流动通道,才能促进工作积极性,形成对青年群体的良性激励氛围。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初次就业市场表现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多方位的,不仅要关注不同就业队列间的收入差距,还要关注同一就业队列内不同个体间的收入差距。

其次,要形成促进青年更充分和高质量就业的协同推进机制。本文再次论证了外生冲击下就业数量向就业质量的传导机制,单纯强调失业率和就业容量治标不治本,单纯强调就业质量则失去了治理目标的精准性。由于就业质量无法直观体现,以失业率为主的就业数量就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了一个“显示器”和“指挥棒”的作用,通过向市场发送经济形势不好的信号来影响劳动力供需双方的心理预期,促使雇主调高雇佣标准,促使就业者调低薪资预期,在双向影响下就业数量层面的负面冲击会传导到就业质量层面,让青年初次就业群体遭受工资惩罚。因此,未来一方面要重视失业率所不能反映的就业质量问题,形成就业质量的指标监测体系,另一方面也要及时干预失业率数据对社会心理预期的负面导向,引导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

最后,消费疲软问题需要从就业层面寻找长效解决机制。新冠疫情发生后,国内出现消费疲软问题,严重拖累了稳定宏观经济增长、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的进程。从我们的研究来看,消费只是就业质量受到传染后的表象,就消费论消费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2023 年 1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以充分高质量就业保证消费需求才是关键所在。在当前财政紧平衡的压力下,我们要有节制地使用消费券、货币发放等短期刺激政策,将财政资金和财政政策着力点主要对准“稳就业”的基本盘,通过稳定存量劳动者的就业岗位、拓展增量就业者的就业机会,努力保障就业者的就业质量不下降、持久收入水平不下滑,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社会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参考文献:

1. 蔡昉、王美艳:《“非典”疫情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 年第 4 期。
2. 丁守海、李书莺、张小丽:《经济周期中就业波动研究新进展》,《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 年第 9 期。
3. 都阳:《制造业企业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反应:基于微观数据的观察》,《经济研究》2013 年第 1 期。
4. 刘灿雷、高超:《教育、人力资本与创新——基于“量”与“质”的双重考察》,《财贸经济》2021 年第 5 期。
5. 刘金东、秦子洋、孔培嘉:《流动人口享受工资溢价了吗?——对户籍来源地“反向歧视之谜”的再检验》,《经济动态》2020 年第 12 期。
6. 刘金东、宁磊、姜令臻:《疫情期间的“消费与产出偏离之谜”:只是失业率问题吗?》,《财经研究》2022 年第 5 期。
7. 罗楚亮、高天一、邹先强:《初始劳动力市场条件与个体劳动力市场表现》,《经济学动态》2022 年第 6 期。
8. 孙豪、王泽昊、姚健:《房价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与实证》,《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2 年第 2 期。
9. 邢春冰:《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考察》,《经济研究》2005 年第 6 期。
10. 岳昌君、周丽萍:《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趋势分析:2003—2017 年》,《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 年第 4 期。

11. 詹鹏、毛逸波、李实:《城镇女性劳动供给长期趋势研究:来自教育扩张和生育行为的解释》,《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8期。
12. 张敏、胡慧、陈波:《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的就业政策效应:二元劳动力市场搜寻匹配视角》,《经济研究》2022年第7期。
13. Abbritti, M., & Fahr, S., Downward Wage Rigidity and Business Cycle Asymmetri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69, No. 7, 2013, pp. 871 – 886.
14. Barnichon, R., & Zylberberg, Y., Underemployment and the Trickle-down of Un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 11, No. 2, 2019, pp. 40 – 78.
15. Forsythe, E., Why Don't Firms Hire Young Workers During Recession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32, No. 5, 2022, pp. 1765 – 1789.
16. Fujita, S., Declining Labor Turnover and Turbulenc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99, 2018, pp. 1 – 19.
17. Genda, Y., Kondo, A., & Ohta, S., Long-term Effects of a Recession at Labor Market Entry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Vol. 45, No. 1, 2010, pp. 157 – 196.
18. Hamaaki, J., Hori, M., Maeda, S., & Murata, K., How Does the First Job Matter for an Individual's Career Life in Japan?.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Vol. 29, 2013, pp. 154 – 169.
19. Huckfeldt, C., Understanding the Scarring Effect of Recess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12, No. 4, 2022, pp. 1273 – 1310.
20. Kahn, L. B., The Long-term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of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in a Bad Economy. *Labour Economics*, Vol. 17, No. 2, 2010, pp. 303 – 316.
21. Maclean, J. C., Covington, R., & Kessler, A. S.,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at School-leaving: Long-run Effects on Marriage and Fertility.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Vol. 34, No. 1, 2016, pp. 63 – 88.
22. Marinescu, I., & Skandalis, 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Job Search Behavio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36, No. 2, 2021, pp. 887 – 931.
23. Michailat, P., Do Matching Frictions Explain Unemployment? Not in Bad Tim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2, No. 4, 2012, pp. 1721 – 1750.
24. Oreopoulos, P., von Wachter, T. M., & Heisz, A., The Short-and Long-term Career Effects of Graduating in a Recession: Hysteresis and Heterogeneity in the Market for College Graduat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Vol. 4, No. 1, 2012, pp. 1 – 29.
25. Ortego-Marti, V., Unemployment History and Frictional Wage Dispersi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78, 2016, pp. 5 – 22.
26. Oster, E., Unobservable Selection and Coefficient Stabi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Vol. 37, No. 2, 2019, pp. 187 – 204.
27. Oyer, P., Initial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and Long-term Outcomes for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0, No. 3, 2006, pp. 143 – 160.
28. Sullivan, D., & von Wachter, T., Job Displacement and Mortality: An Analysis Using Administrative Dat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4, No. 3, 2009, pp. 1265 – 1306.
29. Topel, R., & Ward, M., Job Mobility and the Careers of Young Me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7, No. 2, 1992, pp. 439 – 479.

The Scarring Effect of Youth's Initial Employment under the Impact of Labor Market

LIU Jindong, TANG Shiha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50014)

Summary: The unemployment of the youth has always been a global issue and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China. Under the triple pressure, China's young people are facing a dilemma of rising employment demand and an unpleasant unemployment rate. The urban unemployment rate of people aged 16 ~ 24 has been continuously fluctuating, reaching a record high of 20.8% in May 2023. The unemployment risk has impact in

the short term, but it may also have a long-term impact on the youth to be initially employed. Numerous micro studies abroad have explored the permanent income loss caused by the impact of unemployment risk on the youth,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the scarring effect. Unfortunately, research on the scarring effect in the domestic labor market is still scarce,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sluggish labor market during the post-pandemic period.

This paper selects 2003, the first graduation season after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expansion combined with the impact of the SARS epidemic, as a typical unemployment risk shock event to study the scarring effect of unemployment risk on the youth.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urban household survey (UHS) data has led to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 the impact of unemployment risk significantly exacerbates the mismatch of the youngers' human capital, resulting in a scarring effect of relative income decline for the youth. Second, the income of the youth employed in 2003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ir peers employed in other years, causing an income gap to last for four years before gradually disappearing. Third, the significance and duration of the scarring effect performed differently among groups, and the impact was greater on workers with lower education or in state-owned units. Fourth, the income loss has hindered consumption upgrading. After struggling to maintain the trend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for one year, the enjoyment-oriented consumption began to bow to negative effects and continued to decline for four consecutive year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offer three inspirations for China. First, it is significa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initial employment market equity for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Equal opportunity in initial employment is a key part of initial distribution equity, and its impact on the distribution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and evolve over time, eventually exacerbat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into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gap, which will be carried over to the next generation. Since the impact of initial job market performance on the income gap is multifaceted, we should focus not only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different employment cohorts but also on that between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abilities within the same cohort. Second, we need to develop a synergistic mechanism to promote fuller and higher-quality employment for the youth. Simply emphasizing either of the two will lose the accuracy of the policy. We should concentrate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that is not reflected by the unemployment rate and set a series of quality indicators. Meanwhile, we should timely intervene in the negative orientation of unemployment rate data on social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s and stee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market. Finally, the problem of weak consumption, which has seriously dragged down the process of stabilizing macroeconomic growth and building a domestic general circulation system in China during the Covid - 19 epidemic, requires a long-term solution at the employment level. Our research shows that consumption is only a symptom of the contagion in employment quality, and the essence is to ensure consumption demand with full and high-quality employment.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current tight fiscal balance, we should focus our fiscal funds on the basic issue of stabilizing employment, rather than waste on short-term stimulus policies such as voucher and currency issuance. Only by stabilizing th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protecting the employment quality and permanent income of employees from declining can we fundamentally improve social consumption ability and willingness.

Keywords: Youth Unemployment Rate, Initial Employment, Employment Quality, Scarring Effect

JEL: E24, J64, O15